

何謂「香港文學」？「本土意識」？香港文學作品所體現的是怎樣的本土意識？這種本土意識的演變跟時代步伐有何關係？作家如何在著作中建構和凸顯本土意識？以上種種皆是研討會上三位講者欲探討的藝術課題。楊玉峰教授卻嘗試從另一角度表達出不同的見解。



評論：

多角度考察香港文學 的本土意識

楊玉峰

楊玉峰，香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主講中國現、當代文學，及中國婦女文學等科目。長期從事現、當代小說，和中國婦女作家及南社的研究。歷任「國際南社學會」秘書長、「陳英士研究會」顧問；主編《南社叢書》《國際南社學會叢刊》等刊物，並擔任港大中文系《東方文化》書評編輯。

這一場研討會的主題是：「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當中涉及了兩個概念：「香港文學」和「本土意識」。香港文學的概念比較複雜，或有從作家的身分去界定，或有主張以作品發表的刊物和出版地去區分，至今還沒有定案，我也不想在此糾纏；本土意識就相對地清晰，是指有關香港這地方的現象或情態、思想潮流或價值取向等。概括來說，也就涉及香港文化的一些現象和特質。因此，我們的討論，將會探究一下香港文學作品所體現的香港本土意識，這種本土意識的演變跟時代步伐的關係；從中也嘗試了解作家在對文本題材的選擇，對本土文化的偏好等潛藏的內在情意結。當然，作家如何在著作中建構和凸顯本土意識，也是研究者值得探討的藝術課題。

今天作專題報告的三位學者，都是香港文學的專家。他們的報告使我們能夠從宏觀和微觀，縱向和橫向，進一步認識到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的發展，以及個別作家如三蘇、夢中人、也斯等對香港這片神奇的土地的關注和情誼。能夠聆聽三位專家的高論，必定會令我們大開眼界，獲益不淺。

由於職責關係，我不得不對三位學者的報告提出個人愚見，除了向他們討教之外，也歡迎在座各位給予寶貴意見，交流切磋。

王良和：走入也斯的詩國度凸顯本土情懷

王良和博士的講題是「眼睛的漫遊——讀梁秉鈞三首街道詩」。梁博士選取了也斯七十年代創作的《香港》十首中《傍晚時，路經都爹利街》、《羅素街》和《拆建中的摩囉街》三首詩為切入點，通過文本的細讀，剖析了詩人有意識地選材，身體力行地推動書寫香港，並向古典詩的技法借鑒，加以電影手法和口語化的藝術語言來凸顯本土意識。王博士的分析細緻，深入淺出，觀點清晰，而且能把握詩人七十年代的思想主張作為理據基礎，他的結論實在不容置疑的。

很同意王博士在報告中所說：「《香港》十首在創作意識上，隱喻了作者對個人成長、生活在其中的香港的理解與探索」（見頁37）作家從街道（或兩旁建築物）的體察而捕捉了香港某方面的生活現象，本土情懷是強烈的，但也明顯帶有個人的審美取向。正因如此，王博士指出也斯對一些繪畫或幻燈片中的香港，以為「不是真實的世界，不是我們香港人看到的、感受到的香港。」於是才創作這十首詩，跟王博士有點兒保留地說：「這種選擇是否『不帶成見』，則是見仁見智了。」（見頁37）其實無論是圖畫或詩歌，抑或其他類型的文本，都可視作不同角度或不同形式的再現，藝術的真實跟生活實相必然有距離，這是眾所皆知的，所以也斯的看法有點兒情急偏頗，而王博士「見仁見智」的觀點似乎也可以更為明確一些。

王博士本身是一位出色的詩人，自然對詩歌的藝術形式掌握透切，所以他對也斯的三首作品的技巧和藝術提煉，都有獨到的解讀，我不必再重複贅說。但有一點要指出，報告第五節「道家美學：打開場景，隱退一旁」中，王博士花了不少篇幅分析詩中作者的退隱，以及詩不用標點的特點等來營造審美效果。在我而言，詩篇縱使「打開場景，讓讀者移入」，但敘事者依然與讀者同行，在介紹街景，在抒發感受，只是作者的介入程度有所變化而已；況且，詩題早已暗示了作家的存在，作家縱使有意退隱，也無所遁形。至於《拆建中的摩囉街》的開端，王博士以為可以理解作兩重意思，有兩種標點方式，即前一句後三句：

正午的太陽照 。
 一個蹲在路旁的老者，
 鐵灰色的佝僂的背，
 污水淹至他的後跟。

或前三後一：

正午的太陽照 ，
 一個蹲在路旁的老者，

鐵灰色的佝僂的背。
污水淹至他的後跟。

並指出後者的意蘊更深致。大家都會同意前三後一的意味深長，但我相信不必標點，讀者也會把四句詩唸為前三後一，而不會感到前一後三的斷句方式較佳。因此，王博士引用此例來解釋也斯詩作的特點，說服力明顯不足了。

最後，王博士在報告中期望我們帶學生在羅素街讀也斯的詩，「在當下現實的街道與詩中過去的街道之間「漫遊」 反覆來回，作多層的閱讀和參照，對空間、時間、生命、人事的轉變當有更深的感受。」（見頁54）並建議教統局舉辦「詩與街道——香港文學散步」的活動，促進港人的本土意識。王博士可謂用心良苦，但以詩來「對比今昔」，讓學生生發感悟，恐怕不及用圖象和畫片來得更直接有效。即如王博士剛才在解說也斯的詩作時，也大量利用一些舊照片和圖像來喚起在座各位對香港昔日街道和環境的記憶，顯然他也覺得文字始終不及圖像那樣了當。況且也斯本人的香港情意結，當時是否上升至成為一股普遍的意識形態，被香港大多數人認同？抑或這種意識只局限於一小撮知識份子和文化人之間，並未成為主流意識，後來甚至漸次聲沉影寂？如果以王博士今天還在會場揚聲呼籲，答案是可想而知了。

陳智德：宏觀角度探究文學本土意識

陳智德博士的「本土及其背面」是一篇從縱線和較宏觀的角度去考察香港文學本土意識歷史發展的文章。陳博士回顧了自抗戰前後直到二千年代本土意識的趨勢和各階段的特點，揭示了香港本土意識的變化，扼要概括，具有綜合性意義。尤其是報告以他者的對應觀念來檢視本土的特質，頗有啟發作用。當中援引的文本，很有代表性，足見論文是在堅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然而有幾點必要提出來與陳博士討論：

1. 論文說到：「從抗戰期的論爭強調本土形式的世界性（民族性），亦可見本土的對應面在論爭的角色，一種外來的，要求更普遍性的民族統一戰線觀念和以內地生活為主的內地知名作家的創作，反而促成了本土在另一背面的成長。」（見頁62）這顯然把「本土」視為本地化的創作意識，如任護花的「牛精良」小說系列，以對應一些內地作家要求的民族統一戰線等意念。究竟兩者是否截然地對立？而且民族統一戰線是否可以視為當時本土意識的另一種價值取向，不必摒諸「本土」之外？陳博士顯然對本土意識這概念的把握還未十分準確。事實上並非必須直接書寫香港人或香港城市的有關問題，才可視為「本土」，一些反映香港人的想法或思潮的話題，也可看作本土意識的折射。
2. 文章認為一些戰後小說如《蝦球傳》和《窮巷》的結局，主角的出路是返回內地，跟戰前的作品主角留在香港有別，指出「亦見戰前的本土形式，在四十年代中後期的斷裂性。」（見頁63）予人印象本土意識曾經一度中斷。其實並不一定要歌頌香港生活或描寫主角留在香港發展才是本土意識的表現，否則便會把「本土」簡單化為「正面的香港題材」了。《蝦球傳》和《窮巷》固然帶有民族色彩，更多的是有作家對當時香港現實生活的不滿和焦慮。正因為作家對殖民地政府有點兒失望和感到前途彷徨，所以他們把希望寄托於戰後的大陸祖國，這股民族情緒，是那時部分香港人的共同意識。同樣情況，陳博士引用的舒巷城的文本《鯉魚門的霧》和《太陽下山了》，明顯有濃厚的傷逝和懷舊情懷，也是一種處身五十年代而產生身分危機感的意識作祟所致。正如論文所說：「《鯉魚門的霧》和《太陽下山了》都對本土消逝有強烈的危機感，經驗斷裂指向記憶和歷史意識的失落，主角極力保存的個人回憶，一次又一次被外化在那抹掉記憶的反歷史的現實所衝擊，最後無法不從實地本土中離去，轉化或虛化為抽象的霧」（見頁64）同樣是對香港生發危機感而有「過客心態」，為何不被視作香港/本土意識？

3. 對於九七前後的香港意識，陳博士討論不多，只援引了董啟章的《永盛街興衰史》為例，指出：「主角雖然身在本土，但對本土的認識的空白，因認識上的匱乏，教本土成為了他鄉。」（見頁75）又提到了幾篇小說來說明：「九十年代作者對本土的尋求是以溯源和懷舊為基調。」（見頁75）其實九七問題是香港文學非常關注的課題，當中體現了不同立場的作家，不同角度的取向和書寫，有失落，有懷疑，有憧憬，有危機感，也有民族自豪感等複雜的情緒和意識，例如劉以鬯《一九九七》、梁錫華《頭上一片雲》、陳浩泉《香港九七》、白洛《福地》等作品，這正好反映了香港作家的多元化意識和價值觀，很值得我們探究。另外，相距九七回歸已差不多十年了，香港作家對這問題有何新的見解和書寫模式？他們的意識有沒有因一國兩制落實後而有所改變？我相信大家非常渴望了解箇中的轉變。
4. 陳博士在文末說香港「她那出於無力抵抗的包容，使本土在其不可能、沒市場時，實現了『具香港特色』的本土性。」（見頁78）的一番話，也是較難理解的。

此外，陳博士對本土意識發展的敘述稍為逼促，尤其是踏入二十一世紀後的趨勢如何，論文只作一些臆想，恐怕難以滿足大家的期望。

張詠梅：由通俗文學文本尋本土性

張詠梅博士的報告，與王良和博士的一樣，是一篇文本細讀的論文。她以上世紀五十年代兩個著作《經紀日記》和《憎人日記》為例，論述了報章連載小說所表現的本土意識。張博士從小說的場景設置、人物形象和語言運用等三方面切入，剖析了作品的本土意識，指出「作者藉 這個游離於香港社會邊緣的人物，以其視點觀察書寫香港，刻意與現實保持距離，顯現出作者與筆下所書寫的香港社會若即若離的關係。」（見頁93）文章論據明晰，鋪排有序，觀

點也有說服力，讓讀者從另一角度了解1949年之後一些南來作家如三蘇等他們作品的香港本土意識，也使我们進一步認識通俗文學的感染力。

這 引發了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就是通俗文學與大眾消費市場的關係。很明顯，三蘇和夢中人的選材和建構方式，無非迎合了市民大眾的口味，因而能在報紙上連載多時。作品濃厚的本土意識，拉近了故事與讀者的距離；而篇中刻劃的市民情態，也增強了小說的認受性，甚至可能促進報章的銷量，反過來此種意識也會因傳媒的推廣而得以普及。當中的互動關係及本土意識的商品化傾向，我本來期待 在張博士的文章中找到答案的。另外，大眾化文學跟主流文學，何者更能體現市民的本土意識？研究者如何看待主、次文化的價值和意義？這都是有趣的課題，值得張博士繼續探索。

另一方面，論文詳細分析了小說的三及第語言，這的確是五、六十年代通俗文學的特色（現今報刊文章已進化至四及第了）。當中舉例很有親切感，只是其中的一些廣東俗語例子如「醒目」、「路數」等，在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中也曾見，還需要進一步查根究底，判斷是否為廣東方言。

總結

總的來說，三位學者從不同角度考察了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讓與會者對此課題有更深入的認知。事實上，三篇文章可以互為補充。陳智德博士展開了一幅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發展的圖畫給我們觀賞，張博士則帶領大家進入五十年代的通俗文學（過去備受忽略）場域，去玩味富有香港特色的大眾文本，而王良和博士又導引我們深入七十年代作家也斯的詩國，找尋知識份子文化人昔日的本土意識和香江情懷。三位博士的努力和呈獻值得我們衷心感謝；他們的精彩報告，也肯定是這次研討會的重大收穫。